

委员 笔记

文化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观“梅兰芳主题当代美术作品展”有感

董国圆



董国圆在梅兰芳画作《天女散花图》前拍摄艺术人物造型

作为京剧梅派弟子传人,前几天,我参加了“梅兰芳主题当代美术作品展”,看到展览如此集中地展示梅兰芳大师的书画、文献等资料,并用绘画的形式展现梅大师的艺术风采,在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我觉得这不仅有助于对梅派艺术的研究,更有助于青年一代文艺工作者对梅兰芳艺术精神的理解与传承。

梅兰芳大师的艺术成就与书法绘画有着很深的渊源,从《奔月》《葬花》两出戏服装、扮相的创造,到《天女散花》的编排以及很多表演的灵感,都离不开古典画作的启发。在这里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我有着切身体会的例子。2012年我正式调入国家京剧院,排演的第一出戏就是《韩玉娘》,虽然这出戏是根据梅派剧目《生死恨》重新创作的,但却保留了老戏《生死恨》中“夜诉”这一场的唱腔和布景。在大段《二黄套曲》如泣如诉的演唱中,舞台上布置非常简洁,只有一架纺车、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油灯。每次演出结束,观众走出剧场时都在回味,韩玉娘在一架纺车前、一盏油灯下感人至深的表演——太有意境了!其实这种意境美除了来自唱腔的感

染力,同样来自这堂简洁而又写意的舞台布景。但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这堂景正是梅大师从旧画《寒灯课子图》的意境中思考出来的,这才成就了这场戏唱腔、表演、舞美彼此吻合、共同营造的审美意蕴。

就像梅大师自己所讲,“中国画里那种虚与实、简与繁、疏与密的关系,和戏曲舞台的构图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从事戏曲工作的人,钻研绘画,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变换气质,从画中去吸取养料,运用到戏曲舞台艺术中去。”

其实梅大师不仅从书画中获得启示,很多人物形象还参考过木刻、石刻、雕塑等艺术门类。记得我与师父梅葆玖先生学戏时,师父就经常会对我说起梅大师从其他艺术门类获得灵感,并将这些灵感转化为“四功五法”的过程和经验,同时,师父也鼓励我要多学习、多借鉴,不闭塞、不守旧,戏曲要跟着时代、与时俱进!所以今天,每当我在排练厅给青年演员说戏时,我也会在排练之余把师父讲给我的梅派艺术理念,包括梅大师对自身文化修养的注重……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青年一代听。

我想,对于每一位梅派弟子而言,我们要传承的不仅是梅派经典的代表剧目,更要传承梅大师广征博采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守正创新的艺术精神。这是梅兰芳大师留给每一位京剧人的宝贵经验,是留给这个时代的珍贵艺术财富,更是永久闪烁在文化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名家 名笔

青山绿水留得住美丽乡愁

郭媛媛



环境优美的贵州花溪村

文化建设调研活动,感受内蒙古辉腾锡勒草原、察哈尔湖、苏木山的一派郁郁葱葱,山清水秀,河北洋河、桑干河交界处官厅水库湿地的一脉美丽清新、生机盎然;也曾赴江苏高邮、兴化等地,视察乡村文旅融合新面貌、新格局、新发展,置身新农村建设重拾的生态和谐、田园风光,心旷神怡。尤其2021年5月在贵州花溪村刻有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怪不得大家都来 在这里找到乡愁了”的牌匾前留影时,置身景点观光和休闲度假并重、传统乡村屋舍和“三农”产业兼营的生机勃勃的现代乡村,不由得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清醒地统揽全局,高屋建瓴地把握方向,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方略,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建设理念,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重大论断,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为系统思想,以对当下社

会建设及其明天事业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健康、永续等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定推进自然生态的涵养、保护、修复政策,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两山”理论深入人心;一手抓污染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成效显著;上下一心,下大力气、花大工夫,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取得实效。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的改善,以及强化自然、人文生态的保护性开发,最终实现了青山绿水重现华夏大地的美丽如昨;维护、巩固、提高山林湖水田草等质量、水平,各地干群业已形成共识并自觉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人“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向着和谐化、系统化、本土化、自然化的生态文明提质增效、持续建设中的美丽中国,让青山绿水的乡村不仅是希望的田野,还是唤回游子、留住乡愁的美好家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艺文 从谈

那只战国玛瑙环终陨落尘埃

陈丽伟

“丽伟兄,小时候我在滹沱河床的泥土里捡到一只漂亮的指环,特别喜欢,就一直戴着,后来专家鉴定说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玛瑙环。我一直觉得,我和故国中山文化有命定的机缘,就是因为这只玛瑙环。我的好运,大概也都是这只玛瑙环带给我的。”

说这话时,雪莉同学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在这样文学式微的年代,她依然能靠自己勤奋的史志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步步从河北灵寿县走到了省会石家庄,从业余作者成为了石家庄作协主席、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成为了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和编剧。

10年前,在鲁迅文学院24期高研班上,我们一见如故。除了共同的文学追求,我们还有共同的史志兴趣。我中师毕业参加工作后,在县里作了6年的地方志编纂。雪莉同学更是一直对中山国的史志研究痴迷不绝,并有厚厚的专著出版。她曾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一定要改写历史,让战国七雄变成战国八雄,把咱们中山国加上。”

改写史书比较复杂,但在雪莉同学等文史专家的努力下,冀中的中山国文化、滹沱文化次第以纪录片、电视剧等不同形式登录央视等各大媒体,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我离开冀中已经20年,见到故乡的亲人尤其还是文友自然格外亲切。谈到当年省会石家庄市文学圈里的报纸杂志、领导老师以及很多共同的朋友,更是亲近。我的处女作在我16岁时发表在石家庄地区文联的杂志《滹沱河畔》上,后来地市合并,杂志也改名为《太行文学》,雪莉同学竟做了主编。谈到共同的朋友,有时干脆就拨通手机,在确认新朋友的同时,文友、同学、老乡的情谊更加深厚。

我们那届雪莉同学的时间虽然由半年缩减了一半,但记忆中足堪回味的吉光片羽却络绎不绝——

“丽伟兄,今晚别安排事,我请咱几个同学去喝茶啊。”“去哪里?”“不用管,上车就行了。”

茶过三巡,雪莉同学说:丽伟兄,该是你挥毫泼墨的时候了。在诸位同学的一起呼召下,我借着茶醉斗胆挥毫,留下了一张同学们共同举着一张书法的珍贵照片。现在再看,这张照片里竟然已有三位同学英年早逝:程雪莉同学刚刚离世,年仅51岁;高艳国同学2018年离世,年仅48岁;田静同学2016年离世,年仅35岁。这实在令人哀痛!

其实在鲁院的日子,我的宿舍几乎每晚都会有同学围坐喝茶,同学们亲切地称之为“102茶室”。在来来往往的“茶室”中,雪莉同学作为老乡,自然是102茶室的常客。她那时稍显矜持,一方面是同学相识不久,另一方面,雪莉本身也是含蓄低调之人。她总是静静坐在一隅,虽然不多说话,但偶尔稳重自信的几句谈笑却极具亲和力,让人感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

离开鲁院高研班已经10年,10年里,作为老乡我们比其他同学见面略多。

结业后她第一次来天津采访,这次相聚,以及之后的雪莉同学再次来津,让我陪同她和采访对象会见交流,让我对她的个人能力更为敬佩。她也曾召集部分冀中在津老乡与雪莉欢聚,大家都对她印象美好,以后还时常提起她。

雪莉同学是一个细致周到的人。那年我们区政协文史委到石家庄市调研,我请精通中山国文史的雪莉同学出来陪同,她欣然应允,并带着中山文化的纪念品前来,向带队的领导和政协委员们认真讲解中山文化。

那年,在南阳举办的中国报告文学年会上,雪莉的《寻找平山团》获得迟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前,雪莉说:“丽伟兄,我领奖时帮我在台下拍几张照片啊。”我说没问题的。

她穿着自己专门设计的旗袍上台领奖,我拍的照片她很满意。为了表示感谢,在南潯古镇参观时,她执意要给我买一套上好的湖笔相赠。这笔,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开封使用。

业精于勤,事业非凡的雪莉当然也是一

个勤奋的人。《寻找平山团》出版之前,她已经发表了大量作品,并出版了历史散文集《故国中山》《风从中山来》等著作。

《寻找平山团》不仅让雪莉同学获得了迟迟报告文学奖,蜚声河北文坛,后续的更大的收获接踵而来。各地的学校、部队、文化机构请她去讲座,签名售书,讲述平山团的故事,讲述个人成长历程写作经验。《寻找平山团》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滹沱儿女》,由她做总编剧。这之后她从著名作家又加身著名编剧,成立了工作室,有了自己的团队,接手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文化项目。

作为老同学,作为也是从冀中农村出来,一步步跋涉文坛并曾涉猎编剧的人,我由衷为她的成就高兴,也深知其中的各种艰辛不易,只是叮嘱她别太累。

和大多数女同志一样,雪莉同学也是一个爱美的人。有了条件之后,她的重要着装几乎都是自己设计,甚至自己制作。徐迟报告文学奖的领奖服算是其一。去年在南京参加报告文学理事会,她又是穿着新设计的旗袍。我们相约去找老朋友,从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调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小说家胡文忠老兄喝酒。餐后我们三个河北人合影时,雪莉专门从里侧转到外侧,还呵呵笑着说:

“我得站在外侧,不然我这么美的旗袍就被餐桌挡住了一半。”

雪莉同学走了,走得突然,走得惊心,走得让老同学老朋友们扼腕叹息,她灿烂的生命在怒放时戛然而止。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世界就是这么一次次告诉你们什么是无常。

我想起她珍爱的那只战国的玛瑙环。它的第一个主人已在故国中山烟消云散两千多年,是雪莉同学把它从泥土中捡起,成为了它新的主人。如今,雪莉同学的生命也像那只美丽的玛瑙环一样,来源于故国中山滹沱河的泥土,又复陨落尘埃,留给热爱她的人的,只剩美好的回忆。

(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

文化 与生活

1980年11月29日,江西高安省属第二电机厂基建现场传出消息:某处施工到地下近两米时出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窖穴,大堆瓷器挤占其中。

闻讯赶来的当地博物馆人员连夜展开了发掘。从窖里收获的东西装满了六大箩筐。

回到博物馆,他们对六箩筐器物进行了清点,得到了一份详细的清单:景德镇窑瓷68件,其中青花瓷器19件,釉里红瓷器4件,青白釉、卵白釉瓷器45件;龙泉窑青瓷168件;钧窑瓷3件;磁州窑瓷1件;另有铜器、铁器6件。共计240余件。

当地博物馆人员惊异于此刻摆在办公桌上和地上的发掘之物的美丽惊人。那19件青花瓷,更是蓝彩闪耀,釉色高贵。6件青花带盖梅瓶颈束颈,体态雍容,器盖内壁露胎处和底部分别书有“礼”“乐”“书”“数”“射”“御”六字。云龙鱼纹青花罐盖子仿佛一片漂在水上的荷叶……它们俨然都是有生命的活物。它们在博物馆里舒枝长叶,整座灰头土脸的博物馆顿时变成了一座蓝色的花园。

它们的蓝彩,仿佛大海在阳光下波展,河流在大地上蜿蜒。它们的釉色,仿佛裹挟了古诗里珍藏的不朽月光。它们仿佛是满腹经纶富有书卷气的古代书生,可是,暂时没有人能听懂它们的言辞。它们在博物馆里发着锁定的恒久的光。哦,长久的黑暗并没有让它们变得暗淡,相反因为黑暗的擦拭,它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它们是谁?它们为什么在这里?它们的出现,是想告诉人们什么?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紧找来大量的资料,投入了辛苦的研究之中。

他们仔细查看瓷器的器型、釉色、釉料、纹饰、气泡、足底……经过反复比对,他们确认,它们都是距今700年的元朝至正年间的风物,是流落到英国大维德博物馆的一对举世闻名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同胞兄弟。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震惊和兴奋异常地发现。因为,青花到元代才得以产生,然而元朝短暂,只有97年时间,元青花的创造和制作期只有二三十年时间,元青花因此存世量极少。据北京市文物局编《托普卡比官的中国瑰宝》判断,元代青花瓷目前全世界收藏不足300件。其中国内约100件,国外有200多件。

这么稀少的存量,任何机构或个人拥有一件元青花都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官博物馆,拥有元青花40件,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拥有元青花28件,它们因此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青花博物馆。

而高安一夜之间就拥有了19件元青花,并且,其器形之丰富、保存之完好甚至比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馆馆藏更胜一筹。

高安,位于江西省会南昌西部,距省会南昌只有35公里。它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建县。老实说,这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地方。



▲元代窖藏出土荷叶盖罐

可是因为拥有了19件元青花,高安几乎是一夜成名。它成了与土耳其、伊朗之后比肩的元青花拥有者。2015年,高安建起了元青花博物馆,将这19位元朝的青花使臣,以及同时出土的200多件瓷器与铜铁器,一起展出,供世人参观。走进博物馆的人们在饱览了元青花的风采之后,纷纷打听:这些瓷器的主人是谁?它们为何埋于地下?6件带盖梅瓶,器盖内壁露胎处和底部书写的“礼”“乐”“书”“数”“射”“御”六字,是怎样的暗号?瓷器有朝廷禁止民间使用的五爪龙纹饰,主人是何种身份?元代的高安,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所指涉的,是一个怎样的元朝?

其实从发掘之日起,当地博物馆人员对瓷器主人的猜想和追踪就没有停止。然而,因为可供推断的资料缺乏,有关这些瓷器的真相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有一种说法,这些瓷器是高安人伍先辅、伍良臣父子所藏。

依照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清同治《高安县志》、元泰定《驸马都尉伍公乐泉形状》和《承直郎驸马都尉伍公乐泉墓志铭并序》等记载,伍先辅为窖藏地附近的高安上泉伍家村人,元世祖忽必烈幼女仙娥公主女婿,官至驸马都尉,忽烈死后,调任湖北松滋路总管府民户总管,兼从事商业运输。他是正宗的皇亲国戚,有使用五爪龙图案的权力,又因经商获利良多,有购买这些在元代也是稀世珍宝的瓷器的经济能力。

伍先辅因疾于1325年9月死于老家上泉村,年60岁。他的三儿子伍良臣,忽烈烈的亲外甥,是个爱好诗文与经籍的主儿。“尘视富贵,致力经籍。为诗文物达清润。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

持瓷器主人为伍先辅、伍良臣父子的观点的人们认为,伍先辅死后,这些花重金多处采购的瓷器为伍良臣所拥有。伍良臣爱好诗文,文风畅达清润,自然对包括父亲遗传的瓷器在内的一切美的事物都怀着怜惜之心。在青

高安的瓷

江西



▲元青花兽耳盖罐

花瓷上刻上六艺之名称,符合伍良臣的文人心性。

伍良臣为何又将瓷器埋于地下?伍良臣所著《中流一壶集》记:“江淮骚动,继以南北路断,惟海道可通,朝廷艰危为甚,(伍良臣)欲效微忠而不可得。至正戊戌(1358年,作者注),江西城破……独携扶杖,东走南昌剑邑(今江西丰城市)之魏亭,颠沛流离,风景殊异矣……”《高安县志·兵防志》载:“至正十八年(1358年)陈友谅遣王奉国陷瑞州路。”

——战乱频仍,伍良臣东躲西藏,收藏的大批珍贵易碎瓷无法随从,伍良臣不忍如此精美的瓷器受损,便将其埋入便于记忆的圩堤旁,待局面稳定再作打算。可时局之动荡超出了他的预料,得不到元朝皇族血统的他为躲避随时可能的伤害,有着不颠沛流离。终于有一天,他从历史中消失,从此下落不明……

另一种说法是,这些瓷器根本不是伍先辅、伍良臣父子的私藏,不是文人雅好之物,原因是据考证,元朝时伍家住地在离现址30多里之外,只在明朝中期搬迁至现址,理论上没有埋瓷于斯的可能。而且伍先辅离世为元泰定二年(1325),与窖中的青花瓷生产时间至正年(1341—1370)年份不合,伍良臣只当过八品小官,在元朝,他保存这些带着五爪龙的瓷器,有杀头之虞。事情的真相是,这些瓷器是瑞州路官府的祭器。

据《元史·祭祀志》载:“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颁诸路立社稷坛仪式。”至元十年八月(1273年),元政府颁布政令,全国诸路立社稷坛及祭祀场所,设祭祀仪式。时称瑞州路的高安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元朝的早期统治,瑞州路的各种经济社会状况并不见好。直至至正八年(1348年),色目人禹苏福担任了瑞州路达鲁花赤(总管)。

禹苏福抵达瑞州路,见瑞州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设施及宗教场所破败不堪,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其中,将重修文庙、重振礼教放在了首位。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记载,当地郡学有腐烂倾斜倒塌处,总管禹苏福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之焕然一新。修整在礼殿西面的祭祀场所,在其中设专库以收藏重要的书籍和祭器。

这些瓷器,很可能就是专库里收藏的祭器的一部分。——六个带盖梅瓶,是用于祭神的酒器(蒸馏酒由元朝引进),它们的底部及盖的内壁所书的“礼、乐、书、数、射、御”,不仅是元朝统治者崇尚儒家文化的用意,也是元官廷在祭祀活动中需进行的礼节仪式。其他窖藏发掘的各种瓷器,其造型也都可用祭器来解释。

高安是自古有着道院之称的教化之地,禹苏福的治理很快就有成效。在禹苏福福治之下,元末瑞州路出现了短暂兴盛。

然而战争来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陈友谅部将刘五从瑞州路北直取城池总管府。瑞州路官军一千人马躲避城下,并捣毁了筑架于锦江之上连通南北二城的浮桥、石桥。眼看阻击未果,城破在即,那些元朝的官僚们,深恐这些美丽至极的瓷器会在战火中毁坏,就在城南浮桥头西约100米处的城墙空地,挖掘出一个直径为1.3米、深2米余的椭圆形土窖穴,将瑞州路官府用来祭祀的、而又无法随行的“国之重器”悉数下窖。覆土掩埋后带着家眷匆匆出逃。

由于埋藏较深,六百年来无人发现,直至1980年高安省属第二电机厂扩建,这些祭器才重见了天日。从1980年发掘之日开始,对于窖藏瓷器究竟是文人之瓷,还是祭祀之瓷,一直争论不断,两种说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然而,这两种说法的共识就是,是对文化的珍视,对美的怜惜,让人们即使经历战乱,也尽力将这些精美的瓷器保存下来。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在危急关头为了文化的续接舍生取义的人。春秋时期,孔子率众学生奔走于列国,为礼的传播殚精竭虑。五胡乱华之际,面目模糊的老者,不顾老体衰怀抱着族谱从中原奔袭至南方。抗日战争时期,一群教师领着数千学生从北平一路南迁,在昆明办起了西南联大,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完成了蓄血的伟大工作……

正是这一代代人近乎本能的努力,宛如高安的元青花一样美丽惊人却脆弱易碎的中华文明历经劫难得以完整保存。我想这正是高安的元青花,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作者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华夏